

從土地到語文

蔡秋桐的時代以及現在

From Land to Languages:
The Era of Tsai Chiu-Tung and Now

文 | 洪明道 · 攝 | 顏歸真



雲林縣長鄉五塊村現況，當地多種植水稻、花生等作物。

去年受邀於《一百年前，我們的冒險》選集中，撰寫關於蔡秋桐的轉譯文章。閱讀全集、影像及相關研究後，心中卻留下更多疑問。

了解五塊寮「既邊陲又中心」的地理位置，有助於我們釐清這些問題的背景。在現今行政體制下，五塊寮被劃分在元長。不過，農業社會中往往是以「庄」做聚落單位，以此角度來看，「五塊寮」和「元長庄」兩者相距四公里，中間還隔著「合和庄」，步行約需一小時，可說是「庄跤的庄跤」。

五塊寮在風頭水尾，土質鹽份高，要「種有夠通食」是相當不容易的。嚴苛地理條件與貧窮，在蔡秋桐筆下隨處可見。相對的，國家力量也難以伸進這樣的鄉村，仰賴宗族領導保障人身財產。蔡秋桐在家譜中，就提到了先祖結盟周圍庄頭，形成「頂下六庄」共同防禦。在現代行政劃分中，頂下六庄被切為碎片，涵蓋今四湖、東勢鄉的聚落，五塊寮是這些聚落的中心。

鮮少離開五塊寮的蔡秋桐，留下的作品、影像、書類，能如何幫助我們理解當時的文學場域？他的語言嘗試，對當下的我們有何意義？

現代化力量與新文學

同樣書寫農村社會現象，又都處於新舊文學交界，蔡秋桐時常與賴和被一併提及。然而蔡秋桐不像賴和至臺北求學，有與各地菁英齊聚的全島經驗。蔡秋桐學習日文的年紀，和臺北、臺南、北港等市街的學童相比晚了許多。但和五塊寮庄民、清國時期士紳比起來，不僅時間較早，也是庄內第一人。

蔡秋桐在戰後投稿了「五塊寮保正囡仔條」這樣的孽謔仔話 (giat-khiat-á-uē) ①。這或許反映外來政權篩選、任用仕紳時，在語言文化和傳統社會年齡階序之間，選擇了前者。通曉本土語言和殖民者的語文，影響了蔡秋桐在庄內、宗族的地位。類似的，國民政府來臺幾年後，也晉用不少接受華語教育的少年輩。此時的蔡秋桐，則又被淘選掉了。

蔡秋桐所屬的惠遠蔡氏為在地大族，他花了相當心力整理宗族歷史，記錄由臺南輾轉至蕃仔埔、五塊寮的經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蔡秋桐並沒有溯及渡海之前的宗族歷史，或許因為年代久遠資料難得。無論如何，這樣的敘事已將宗族源頭定於開臺一代。

蔡秋桐擔任保正隔年，便接掌宗族公業。宗族在他接管不久後，便進行改組，開拓產業，勢力更上一層。蔡秋桐的新式日本教育、任職保正、總管宗族，時間上三者並進，其中更細緻的交織關係仍有待爬梳。在惠遠族譜中，他更邀請到賴和、林獻堂題字。可見他新文學作家、漢詩人身分所衍生的人際網絡，也為其宗族添光。那麼，出身

草地 (sháu-tē) ②的蔡秋桐，是如何搭上新文學的列車？

在這裡，列車不僅僅是個譬喻。五塊寮的經濟和交流，以北港和虎尾為重要節點。北港因宗教祭祀，以媽祖廟為中心發展為熱鬧的街市，所輻射出來的網絡涵蓋鄰近的五塊寮，並不難想像。虎尾則在1910年代受惠於糖業，快速發展為市鎮。為了運輸原料打造的糖業鐵路，就這樣將五塊寮納入了現代交通網絡。蔡秋桐的新文學創作集中在1930年代，穩定的運輸和郵政系統，不僅讓蔡秋桐得以投稿至北部的報業，我們也能推測，蔡秋桐極有可能經由虎尾糖鐵轉乘縱貫鐵路，至臺中參加全島文藝大會。

臺文館出版的《蔡秋桐影像集》，更讓我們瞥見蔡秋桐的複雜和矛盾。他在〈奪錦標〉中諷刺為防治瘧疾而舉辦的競賽，自己卻也得了不少防瘧獎狀。他以飛白手法 (malapropism) ③，用臺灣話扭曲日語，來諷刺日本警官。但他也擔任國語普及助成會長，後來長子更參與陸軍志願役至南洋出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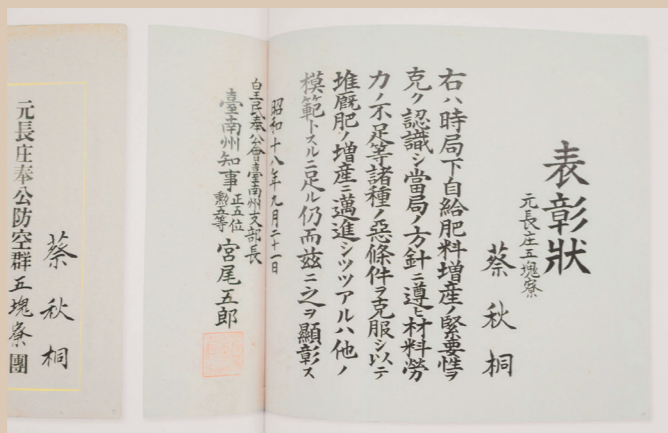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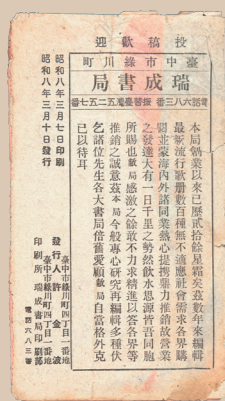
深究文和語

若不將白話字文學納入比較，在漢字為主的新文學中，蔡秋桐的作品是臺灣話文密度最高的一批。其中記錄了現已少用的台語詞彙，例如「用路 (īng-lōo)」、「掖掖是 (iā-iā-sī)」，這些詞彙多能在《臺日大辭典》得到印證。也有不少套句，如「狗毋吠，納狗喙」。

註 | ① 歇後語、戲謔嘲諷的話。

② 鄉下。

③ 此處並非因使用口語或方言，就指稱為飛白修辭。此種理解以方言來框架臺灣本土語言，也沒有指出修辭的功能，難以稱之為真正的修辭。此處指的是「故意將聲音類似的語詞寫錯，以達到喜劇或諷刺效果」，概念上更接近 malapropism (飛白手法)。



1 | 2

1 歌仔冊（臺文館／圖片提供）
2 蔡秋桐增產自給肥料以增進糧食生產的表彰狀，《蔡秋桐影像集》，頁 144。

不過，其作品變異度也相當高，有幾篇接近書面語或中國白話文的作品。這樣的差異，不少研究者試圖提出解釋。然而，這些解釋往往並未深究「語言」、「文字」與「運動」，因蔡秋桐中國白話文色彩濃厚的作品發表時間較晚，便將之視為臺灣話文嘗試的中控，以及蔡秋桐個人的轉向^④。

讓我們回到當時五塊寮的語言環境。總督府國勢調查中，1930 年能說日語的臺灣人約 8.5%，1920 年日本人會說土語者則佔約一成。我們可以據此想像五塊寮中，庄民多使用泉腔臺灣話，混用少數日語詞彙，受過教育的仕紳則能說臺日雙語，日人也有部分能說臺灣話。

蔡秋桐的作品透露了一些泉腔的線索，例如將雞母寫做圭 (kue) 母。對話也反映了多語混雜的環境，頻繁轉換日語、臺灣話的語碼 (code switching)。其中亦有接近中國白話文的段落。

漢字的使用增加了文、語對應的複雜度。以當今角度來看，這些段落讀者慣用華語發音。然而蔡秋桐並無張我軍等人中國留學經驗，對華語語音掌握有限。訓讀現象在台語歌仔冊中屢見不鮮。例如歌仔冊有些漢字寫做「能」，發音時卻使用該漢字台語同義語詞讀音，而讀作「ē」。

再者，香港的書面漢文接近中國白話文，當地人多以粵語念讀，稱之為書面語。就蔡秋桐來說，或許也是如此。較為合理的推測是，蔡秋桐學習中國白話文的語法和常見語助詞做文，和同輩新文學作家交流，念誦時仍以臺灣話為主，部分詞彙則以臺灣話訓讀。

有些研究者則依功能和性質，來劃分蔡秋桐的語碼轉換，即對話用臺灣話文，敘事用中國白話文，「俗」用臺灣話文，「雅」用中國白話文。這或許是受到 1970 年代鄉土文學框限了想像。若將蔡秋桐的

作品，與 1970 年代鄉土文學作品並置，會發現對話與敘事的分裂，在蔡的作品中並不明顯。

一些富具象徵性的敘事段落，蔡秋桐混雜大量臺灣話文書寫^⑤。他甚至巧妙的結合書面語和臺灣話文的特性，製造出相當有節奏感的段落^⑥，發展出臺灣話文敘事的美學。

漢字和文的複雜性，使得 code switching (語碼轉換) 以語言為中心的觀念，無法準確描述蔡秋桐的作品。以中國白話文來理解，忽略了背後的台語念讀和發展為書面語的可能。以「雅／俗」、「敘事／對話」來劃分，更是無法有力解釋。語和文糾纏的關係，加上戰後本土語言能力流失，使得這些作品變得難以親近。呂美親團隊在《台語現代小說選》中，以教育部台語漢字及羅馬字編輯〈連坐〉，除了讓人佩服編輯所需下的功夫，更是具備「原音重現」的意義。

行對佗位去

回頭看蔡秋桐的臺灣話文書寫，有諸多令人感慨之處。

蔡秋桐書寫時，島上約七成的人口使用臺灣話做常用語，客家人有高達 90.2% 的客語使用率。他的書寫對象雖多說臺灣話，然而受限於教育資源，少有人能閱讀他的作品。或許如此，蔡秋桐後來創辦醒民社，想以話劇傳播啟蒙概念。

這種「文」難以乘載「語」的溝通困境，持續糾纏臺灣。到 1970 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仍然如此，吳念真曾感慨，他寫的小說，似乎很難安慰到他寫的那些人。這些困境，一再彰顯本土語言書寫和教育的重要性。

我們要怎麼做，如何復興本土語文，時空條件已和蔡秋桐大不相同。1930 年代臺灣話文論戰時，其「臺灣話文」和「中國白話文」的對立，並無當今本土語言流失、華語佔絕對優勢的狀況。強勢的華語教育，幾乎完全扼殺了台語念讀中國白話文，而發展出書面語的可能。本土語文創作者除了在書寫系統上需和讀者磨合，還需對抗時間與遺忘。蔡秋桐的作品意外成為了時空膠囊，成為寶貴的語料文獻，被視作建構台語文學史的文本。這或許是蔡秋桐書寫時，從來沒想過的吧！

洪明道

1991 年生，現為住院醫師及下班時間的寫作者。長期關注臺灣文史、非類型小說的創作及評論。出版《等路》、《祝福的意思：等路台文版》，曾獲金鼎獎及臺灣文學獎金典獎。

註 | ④ 關於蔡秋桐的中國白話文作品，我提出了另一種解釋，詳見《一百年前，我們的冒險：臺灣日語世代的文學跨界故事》文學冒險卷第三章。

⑤ 「可惜，那花紅柳綠的衣裳，被那無情的日光曝曬強強退色」——〈媒婆〉

⑥ 「乖乖巧巧、正正直直排著列，靜立在大路邊的木麻黃，被那冬夜的風打得施施雪雪、擺擺搖搖。在這樹腳遠遠看見有一個人手提一個包兒，行向衙門去」——〈保正伯〉